

丝绸之路上的诗人(十六)

徐兆寿

叶舟

许多年以后,每当谈起兰州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但凡躬逢当年盛事的文艺中年们立即焕发青春活力,拉开话匣子口若悬河地搜罗各式传奇往事,讲个三天三夜也不在话下。甚至好事者凭借道听途说也能大谈特谈,好似一份曾经占山为王的荣光。而在亲历那个所谓黄金时代的作家笔下,那是一段血脉贲张、野心勃勃,为野蛮生长的诗歌和理想豁出一切的深情岁月。在这些窸窣的记忆片段里,总会一致默契地提到一个名字——叶舟。

叶舟总是以大哥的面目出现,这里的“大哥”既有兄长之意,又有艺术与精神的引领作用,更多的时候是豪爽快意的江湖义气。诗人唐欣作此描述:“我同叶舟相识甚早,当年他是一个被某些女生称为‘小汤姆’的可爱男孩,仗义、人缘好,下笔飞快。我们一块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热闹,青春时代躬逢盛事,不亦乐乎?1988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当诗人叶舟在西北师大敲开我的宿舍门时,我就成了他的兄弟和学生。我提着吉他和啤酒跟着他开始写诗。直到大学毕业,我才与他分道扬镳。”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叶舟仍旧是青年诗人的领袖。

有意思的是,叶舟仿佛就是那个美艳八方的秦罗敷,在他人的眼里、心里、文章里恣肆游弋,自己却是奔流在兰州的夜色中不肯轻易显形。若将那些闲散在各处的留言短笺煞有介事地收集一番,也不过是潦草地搭出一个幢幢的侧影:出身于一个铁路家庭,在凉州和兰州成长,漫长的铁路伸进他瘦弱的身体,成为他后来不断远足的深层原因。而凉州大地的浩荡原野将他的心灵从眼睛打开,这使他后来常常去了望辽阔的边疆。兰州的黄河则像一瓶啤酒,不断地使他的灵魂燃烧。这些童年的地理物华造就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灵。他必须定期出走。

他从诗歌起步,在兰州一中读高一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上大一时,大量的组诗见诸全国报刊。大二时,他的小说处女作刊发于《作家》杂志。他聪慧,才思敏捷,阅读广泛,且记忆力惊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勤奋和坚持,他可以为了为一首诗殚精竭虑,也能够为了一篇“六亲不认”,闭关谢客。他在大学图书馆里的阅读和写作使他接受了文学经典的洗礼。那正是口语诗流行的先锋时期,所以他又融入那个向经典叛逆的大潮之中。这就不难理解,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小说,一直在先锋的道路上行进,那些外国现代派大师总是不经意地陪伴着他,但也时不时地掉入潮流之中,口语派、非非派、民间诗人们总也与他为友。这是他青年时期的彷徨所致。诗人叶舟在《月光照耀甘肃省》这首诗里,不但描绘了一个兰州的形象——它由一条河流、一座白塔、两座山脉、一群羊、一碗面混合而成,而且还把自己写成一个兰州人,一个正在吃牛肉面的人。“叶舟于兰州一只船上。”这是叶舟多年以来给自己诗文的留有的一个抹不去的胎记。

“一只船”是兰州一条寻常街道的名字,是他出生并成长的地方。这里相传是一群江南亡人的墓园。当年清廷重臣左宗棠跨越黄河,准备入疆平叛时途经此地,赞其风水奇佳。后来,一批批将士阵亡。左宗棠就在此为他们修了一座船形的墓园,船头向着南方,遥望故乡。叶舟的故乡也并非兰州,而是几百公里外的凉州。在这座漂泊性的城市里,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个故乡,只可惜错把他乡当故乡是这个时代里早就被注定了的事。对一只船的怀念,是叶舟最美好的少年时代的记忆,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构建的雏形。

“那时,一只船街上遍布着许多家属院,窄窄的街道两侧,密布的是浓密的左公柳。我家就生活在一户大院里,在街的尽头住着一位活佛。”“……每年秋天的时候,藏族同胞千里迢迢来这里朝拜活佛,三五成群地逗留在那条浓荫遍布的街上。”少年叶舟,从一只船小学放学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那些身着“奇异”服装的、说着听不懂的悦耳之音、脸膛红黑发亮的人,不由得发出了“他们是谁”“从哪里来”的好奇之问。久了,双方也就莫名地熟络了,偶尔凑上去“搭个讪”,从他们手中得到美味的奶疙瘩,还能乘机摸一摸他们身上的串

珠……“草原上的人们拿着最好的酥油和肉是来看活佛的。可是活佛年事已高,不可能每天见那么多人,所以他们就暂栖在街边的树下,等待召唤,这让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足够好奇。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打在他们的身上,羊毛的翻领上闪着光,那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光泽。这可能是儿时埋下的种子吧,那种神秘的因果。”叶舟说。他记得,小时候每天清晨当他起早学习时,隔壁的回族老爷爷也已起来做早课了。老爷爷将院子扫干净,把跪毯铺在地上,开始诵读《古兰经》。晚上,叶舟做功课,老爷爷又要做一遍晚课。至今,叶舟还会背那些经文,虽然完全不知道意思。兰州就是这么一个繁杂的城市。每个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沙,在这里聚集。他们被混杂的力量裹挟到这里,又赋予了这座城市模糊不清的特点。

叶舟是他同时期的作家中很早就把自己生活的兰州作为文化地理和精神家园进行书写的作家,而且是最为自信,坚持得最彻底的一个。前两年在朋友圈疯狂传阅的一篇名为《兰州暗流》的文章,这是一个叫沈佳音的北京记者撰写“一个作家与一座城市”的系列之一。叶舟与兰州这座城市精神的契合度之高和血肉关联之深也就毫无争议了。在《何谓边地生活——以兰州为例》中叶舟以兰州为起点,画了一个地图:“兰州是一个微弱的盆地,其地形为两山夹一河,黄河匍匐其间。狭长的地带,随着河水的蔓延几成东西近百里的城市走势,而南北两山的距离则仅几公里。以兰州为起点,渡过黄河向西,翻越乌鞘岭,就是祁连山雪水养育的千里河西走廊,这也是被史书诗意地誉为‘丝绸之路’的贸易大道,玄奘走过,法显走过,班超与霍去病走过,张骞走过。在岁月的深处,它是一条大蒜和玻璃之路,是一条杂耍小丑和茶叶之路,是一条传教士和探险家之路,还是一条战争与媾和之路……”

在兰州,宽阔的宗教仿佛一条河床,牢靠地托举着各民族的心理与期望,而在河床里奔腾的则是世俗的生活,以及简单的日子。它的日常生活波澜不惊,与其他的城市毫无差别,但在日常生活的内里,则是湍急的宗教,是信仰的走向。叶舟曾这样描述兰州城里穆斯林的宰牲节——“按着经上的说法,当初,主欲试探一下易卜拉欣的诚意,遂让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祭献给主,就在易卜拉欣动刀的一刹那,主显露了至高的神圣,用一只羊将易卜拉欣的儿子替换下来,以此来嘉许易卜拉欣的忠诚。节日来临了,曙光初现时,兰州的大街小巷里涌动着如云的白号帽与盖头,穆斯林群众走进各个清真寺里,赞唱着主的恩德,这是一种气势恢弘的合礼,一个精神凝聚的磁场。如果不是身处其间,你无法感悟到一种漫漶而来的震颤,也无法聆听到那种清水一般流淌的大音。合礼完毕,穆斯林群众就去市场上挑选牛羊,一般来讲,牛羊须是肢体健全、眉清目秀的那种,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七人可以合买一头牛,羊则每人一只。宰牲时,一般都会邀请阿訇先诵念一番,然后将祭献的牲畜举念给家中亲人,祈求主的赐福与恩典。在这一天,形状各异的清真寺穹顶闪烁着光芒,一轮新月在夜空里深邃悠远。”这是一座粗陋简单率性而为的城市,但也因此更真实动人。

叶舟是西部新的旗手。在张承志、昌耀之后,他的歌声嘹亮,他的花儿忧伤。在西部,除了张承志,再也看不到像他那样对西部如此高远清澈的歌唱者,把青铜枝下的花儿唱破,滴出血来。叶舟接过了周涛、马丽华、昌耀、张承志的接力棒,在西部高原热烈地奔跑,热情地歌唱。歌唱,是他最为动人的姿态。他所生活的西部,尤其是悲壮的西北大地总是将他的激情调动,将他从世俗的留恋中拉入诗神的身旁。他又情不自禁地歌唱起来。于是,海子成为他的西部变调,昌耀、马丽华、张承志,最后是杨显惠,不断地闯入他精神的领地。他拜他们为师,他与他们把酒为欢,他与他们结伴行走。最后的最后,他遇到了更为伟大的老师:佛陀。他真正走向了精神的高原。

年轻的读者总会惊骇于叶舟《大敦煌》的厚度和分量,四百多页的篇幅,从丝绸之路到青藏高原、新疆再到蒙古高原,尺幅之辽阔着实令人惊叹。代后记里,叶舟提到在百年沧桑的道路上,自己在一种被史书所称的“凿空”中逐渐找到了一种隐约的结构和准



确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企图的岁月,在滚烫消逝的商贾、戍卒、释子、探险家与冒险者以及时间的骨缝里,一眼看见了心中辉煌的遗址和废墟,找到了自己要诉说中的伟大敦煌,以诚实的文字重新建筑了一种纸上的风景和城邦,一个涵括了秘密命运的快乐。

叶舟的敦煌不仅是地理上的,虽然他提到了三危山、七重阁、丝绸之路等地名概念;也不惟是历史的,尽管他涉及了马可·波罗、王道士、斯坦因等真实人物。如他所言,这是对“一座遗址的传奇和重构”,是他的精神宫殿,“所谓宇宙的乡愁和广阔的忧伤于我而言,只是穿行在北半球日月迎送下的这一条温带地域中,它由草原、戈壁、沙漠、雪山、石窟、马匹和不可尽数的遗址构成。在一首一以贯之的古老谣风中,它更多的是酒、刀子、恩情和泥泞、灾祸、宗教、神祇、生命和牺牲,正义和隐忍提供着铁血的见证,而在人类的烽燧和卷册中,楼兰王国、成吉思汗、丝绸之路、风蚀的中国长城、栈道、流放和最珍稀的野兽如今都成为一捧温暖的灰烬。北半球这一段最富神奇和秘密意志的大陆,不是一个地理名词,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更不是一个时空界限。它是文化的整合,是一个信仰最后的国度。”

在他的建设图纸上,“以敦煌为中心——这神的山系、梦的家园和艺术的圣殿——自东而西纵贯的是几千年尘封的历史:从汉文化的首都长安起步,穿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和帕米尔,然后转至中亚高地,直至波斯高原或地中海文明,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而以敦煌为中心,向北可以抵达蒙古高原、中亚最茂密的草原地带,及至北温带俄罗斯文明的丛林;向南,经唐蕃古道,转过拉萨及世界第三极,抵达南亚次大陆。这是生硬的大陆和蔚蓝色海洋、汉胡、高原戈壁横亘万里的横断面。敦煌即成为人类所共系的一个情结。在这处情结上支撑而起的,是一个诗意盎然且历尽劫波的国度;东是由孔儒哲学和风水地理构成的汉文化;西是伊斯兰的圣房、耶路撒冷以及圣经与希腊罗马的神谱哺育的亚当的子孙们;由南及北,是佛教的兴起和藏蒙之间喇嘛教的传唱,来到俄罗斯最隐秘的文明深处,成为哀歌和低吟。评论家唐翰存曾这样概括叶舟和他的创作——“逡巡所及,那些埋在土里的、散在风中的、藏在古书深处的,都成了叶舟用文字强力干预的对象。沿途所至,俘获花儿、羊皮、飞天、马队、丝绸、经卷、号角、王的遗冠和白帽上方的阿拉伯声音,边走边抒情,迅疾而热烈。与其说叶舟是一位义无反顾的抒情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义无反顾的劫掠者,向西取火,向东点烟。”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抒情和英雄激情全线崩溃,汉语诗歌早已冷却。但叶舟是敢于逆行,抗衡时代的诗人。叶舟在《大敦煌》中把抒情诗人的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声称:“我力践于一种简约、奔跑、义无反顾和戛然而止,像一把断裂的刀子,锈迹缠身,雕刻了可能的诗句。需要重铸的依旧是内心的飞行、吹鸣、隐忍和迎头痛击——因此,我执义于文字的正义和血,吟唱深处的速度和加速度,泥沙俱下,坚守甚至退却,即使含有隐约的失败和微明的真理。”

叶舟是听着心灵深处的召唤不自觉地爬上山顶的先行者,是那个在大部队中走散的士兵。当西部的小小说在一片乡土的苦难中不能自拔之际,叶舟走向了佛陀悲悯的高原,走向了世俗狂欢的都市。他不只是西部的,也是中国的。很少有评论者对叶舟的文学给予一个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定位。事实上,叶舟很早就到达了那里。形单影只,孤筏远洋。也该是时候重新去理解叶舟,重新去发现叶舟了。(未完待续)